

# 张开焱神话研究一瞥

## ——读《世界祖宗型神话》

胡光波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对文学研究的渗透,人们已不仅把神话作为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原始思维和文化心理来对待。多学科视角和方法的介入,使国内神话研究呈现新的景象:单篇神话的解读、神话选的辑录、神话历史的勾勒,让位于神话哲学思维的探求、神话结构类型的划分、神话叙事模式的构建,乃至神话整体文化价值的挖掘。张开焱先生《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以下简称“祖宗神话”),则是一部系统地对神话深入研究的集成之作。

其实,张先生今之所成,源于昔之所就。他精研西方文论四十年,二十多年前,曾撰写《神话叙事学》与《文化与叙事》两书,将文化、神话、叙事综合审察,归纳神话的叙事结构与模式,为现在的“祖宗神话”的研究做了理论预设。这部书已非前此的纯粹思辨,而是细考大量神话史料,展示中国上古创世神话丰满的肌理,既沿波讨源以寻祖归宗,又滤去表象而重划类型,从而过滤出远古创世神话的文化意蕴。

本书所言的中国创世神话,限于夏商周三代,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原创神话由形成胚胎到发育成熟,后代的各种文化意象,莫不从中找到端倪,其中既包含深厚的文学价值,也涵容多样的宗教祈向,而其中神力与超人所达之的,呈现了先民的认知路径与宇宙模式,逗露了一个民族试图摆脱蒙昧、追求形而上的慧光。

何谓“创世神话”?作者如此界定:“以天地宇宙、日月星辰、诸神世系、人类(民族)与万物的创生、劫难与再创生为主要内容的神话。”(P5)基于此,全书运思采取逆推,从周经商到夏,引领

读者观赏三代创世神话的秘趣异味,在探幽索隐中得到智慧的提升。作者回避对史料的简单归并,而是对其中的模糊歧义,重行梳理释读。因此,成书虽达五十多万字,但不托诸空言,也不呈思炫功,而是论由史出,臧由我判。尤为引人注目者,每遇史料佚逸、史相晦暗,作者往往归笼零碎,使神话图像“破镜重圆”。

因此,“祖宗神话”引用有序,虽考释字义不厌其烦,但并不以考证为限,而是澄清孤立的个案后,运用实证逻辑、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方法,聚拢一个个孤立的神话,捋出中国神话精神递进的轨迹,既展示三代创世神话产生、发展、推衍的全景,又分析其构成模式和叙事类型,最后将其潜存的民族灵魂揭示出来。作者以“历史还原”为基,但着力在神话“原型重构”,特别是还原夏商两代创世神话的初始面貌,以抹去被后人传说化、历史化与伦理化的痕迹。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求得一个民族后代的文化文学意象的合理解释,因为按西方原型理论,创世神话的最初意象和结构相对稳定,而其表象各代人可按其意图,不断拆散整合。职是之故,三代创世神话是中华后世神话的“祖宗”,揭示其所蕴含的文化因子,才有可能最终解密民族文化。当然,在阐释的过程中,作者已清醒认识到原型理论的缺陷,适度引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论,既承认语言深层结构的稳定,又考虑到它适时地调整。因此,抉出神话原型固然重要,而分析其在后代的变异,作者也在在留心,否则执守远古的“固化原型”,难以解释后代的“脸留心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对待鲧、禹、启、炎帝、黄帝、伏羲、女娲等人物:究竟是“传说中的神性人物”,还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作者基于对史料的理解,将其定性为

神话传说中的古代圣君。由于夏代的史料残阙，这种推断，似乎出于阐释目的逻辑先验，具有很大的冒险性，但如果因为历史的空缺就徘徊犹豫，史学研究只能止步不前。相反，由于作者大胆判定神话人物的性质，也对他驱遣史料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想象，我想只要论断合乎情理，也未尝不可。

如前所述，“祖宗神话”是一部文化史学论著，而各类史书记录的神话，多有支离破碎、记载相互出入甚或齟齬之处，因此对史料的辩证，就成了立论的根柢。本书三部分，对引用史料的分析，针对不同情况，有所区别：或大量引用史书，对同一论题的不同说法逐个分析，指出各个提法的疑窦，然后再引用内证外据，提出修正，如“盘古创世”究竟是本民族自发而生，还是受异民族影响的次生物等；或对传世文献分句校点考证，对权威的说法异议，然后给出新的论说，如楚帛书“创世篇”文义与“启棘宾商”诗句群新释；或从神话人物舜、俊、夔等入手，对字义溯源发微，揭示其故事在后代的不断叠加丰富，所能传达出来的神学意味，如“瞽叟生舜”、“混沌凿死”与“女娲抟人”等；或将创世神话中的事件和人物，与世界创造、远古灾难和农业生产等联系，揭示其性质、作用、意义以及所能传达而出的历史信息，如“俊生十日”、“羿射九日”“共工触山”、“女娲补天”等。兹以对“楚帛书（创世篇）”的解读为例，以见其阐释之法。

楚帛书出土已七十多年，海内外学者解读者众，其中“甲篇”是一份罕见的创世神话，因文字错讹脱落，几乎难以卒读。虽有商承祚、巴纳德、蔡季襄等人解读在先，饶宗颐、曾宪通、董楚平等入紧承其后，但文字扞格、歧义多向，常令人无所适从。“祖宗神话”除广取各家说法，又动用传统小学、民俗学、考古学、历法学等知识，对其详尽辨析，最后绎释该篇文字的意义。对一本史学著作来说，插入十八页文字训释，似有悖论说体制，但不如此，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神话。基于此，作者归纳出这篇创世神话的叙事结构——从世界初创→产生灾难→再创重生的过程，总结其叙事规则：从伏羲生与女娲为妻，到混沌生阴阳，阴阳二神生空气四神，充塞天地，形成空间，再到大水茫茫，四神令阴阳二气鼓动，四神通过轮值推出一岁四时，最后发生宇宙灾难，四神又创造消灾，使世界秩序稳定。从这一文献，作者总结出中国创世神话的类型：“世界的创造来自于一个或一对原始神祇，他通过生殖诸神的方式创造了世界，他既是诸神之祖，在神话中又是特定民族、部落或民族的祖先。”（P143）也就是所谓的

“世界祖宗型神话”。不过，请大家注意，作者认为这个神话中的诸神与原始父母并未彻底世系化、血缘化，还只是世界祖宗型神话的组合型，也就不是真正的“祖本”，是后起的创世神话，但已呈现具体而微的祖本叙事模式了。

“祖宗神话”不仅在史料的分辨中，显示出辩证能力，还本着“人无我有”的原则，勇于在学者较少涉足的领域拓荒。商代介于夏周之间，在远古创世神话的流传中，承上启下，但向来因资料奇缺，学人多分析单个意象，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少。本书将所见的神话材料聚集，抓住本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神话人物帝舜及其父瞽、帝俊、羿，将这一时期神话的演变描述出来，并揭示各个神话人物的文化寓意。正因史料寥寥，这一部分恰能显示作者条分缕析的本领：不仅说明故事的基本意义，还要将隐于言后的神话主旨揭示，时有修正前贤或推进前贤的观点。且看对羿故事的分析。

“羿射十日”虽然最初记于《淮南子》，其实多日并出降灾人类的神话，早就流传于中国各民族中。记录故事发生于夏代，作者认定其原始底本应由商人演绎而出。其实，说其起于夏代中后期或商代，都有可能，因为都是对神话中的古代圣君（依本书作者）故事的编排。一般将此故事说成“神性英雄射日，为民除去灾害”。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作者认为如此看法，对这一神话的意义未免“降格以求”，尚属浮泛。他认为，此故事“叙述的是商人神话中，世界初创之后，曾经发生了一次宇宙大灾难，神性英雄后羿接受上帝俊的指令，平息了这场灾难，恢复了世界的平衡。”（P248）作者指出，此故事虽不见于今本《山海经》，但王充《论衡》与成玄英注《庄子》，都曾引用《山海经》关于羿的记载，可见在流传中失落了。同时，屈原《天问》亦有所载。可以断定羿射日在战国广为人知。因《山海经》所载神话为民间长期流传，故羿的神话源头更远，所以推定为商代，当与历史真实差距不大。

现代一些学者以“日晕”或“折光后的幻日”，来解释“十日并出”现象，作者以为不妥。因为上述现象只在地球极地才看到，即使发生在商人生活的中原，商人所见正好是十日，其概率也极低。再说若以“幻日”解释神话中“常羲生十二月亮”，以实情理解“九头或九尾兽”，就十分牵强。所以神话出自先民的想象，而非实际观测所得。作者指出，十日并出，凶虫猛盖出笼，宇宙秩序大乱。那么，十日并出与羿射九日究竟要表达什么意义？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指出“羿射九日象征太阳历的衰落”。作者受

其启发,进一步追问十日神话与太阳历有何关系,商人已有帝俊妻羲和与生十日故事,为什么又虚构羿射日?为此,作者追溯太阳历在西夏、东夷、苗黎三大族的使用情况。原来,太阳历一年十个月,为夏人所用。商人取代夏以后,“为了确认对那些重要文化成果的创造者和拥用者的地位,要通过这种神话形成完成创造主体的转移和重新确认。”(P250)商人使用一年十二个月的太阴历(原因略去),对一年时序的划分,更符合农业生产需求。废太阳历用太阴历,不仅是历法的变更,更是要满足一个崛起群体精神的自信和权力在握的需求,何况太阴历更切合实用,这就是射日故事的深层寓意。

毫无疑问,“祖宗神话”的第三部分“夏人创世神话”,作者倾注精力最多,而阐释的难度最大。这部分以夏人祖神鲧形象为分析切入点,顺次将禹、女娲、启等神话人物故事贯通,揭示夏商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和文化元码。为了给解释提供一个明确的逻辑基点,作者特意指出:“鲧、禹的父子关系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和历史上的脉承关系,而不一定是简单指真正具有生殖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这种文化和历史上的脉承关系,在神话中,往往被描述为生殖意义上的血缘关系。”(P296—297)

为了说明鲧这个创世神话中最早“祖宗”的成因,作者将他与埃及上古神话中的奥赛里斯比较,复原重构其在西周和后代南方文化系统中的神性特征和原初故事形成。这种比较的基础,就是上古的埃及和中国都是农业国家,其最初的文化意象,最有可能是从农业劳动中虚构出来。奥赛里斯是埃及最早的农业神,教人们耕地种植,筑室建城,过上安定生活,故被人推为国王,这种神属于“善神”。《尚书·尧典》中的鲧,貌似“恶神”:忤逆天帝意志,反对尧禅位舜,瞒天偷取息壤,治水九载垂败。但是,到屈原《天问》则认为

鲧治水不成,是四岳推举的失察,再说鲧虽治水不成,但为后人治水打下基础,天帝刑之是因其“婞直”。诗中还说鲧带领人民开辟土地,从事稼穡,简直就是农业神。对此,鲜有中国学者论述。

作者不满足于此,引史料推论,鲧在周以后是禹的父亲,以农业神身份出现,但在夏代的更早期,可能包孕比农业神更丰富的原始神性。为此,作者引用《国语·鲁语》和《左传》的记载,指出鲧是一只三足神鳖,最初是一位女神,后兼有双性同体特征,在夏以后男权社会才演变为男神,这从“鲧”字的构造和后世典籍中,可以找到依据。鲧性别的变更,是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变,原来在母系社会中被人膜拜的女神,或稍变为男神,或为男神所控制,成为神界的配角,并被妖魔化为恶神。鲧不仅是治水失败的英雄,也是人类性别历史转变中女神命运的标本,从中可见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信息。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作者越出文学畛域,把神话人物形象的生成,与中国远古历史,尤其是中国农业社会这一性质结合,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意蕴。

张开焱先生《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一书,把神话创世的元神与古代氏族、部落或民族的祖宗神联系,指出中国神话主体的神人合一性,创世的元神通过生殖展开,由多代神完成,且要克服各种灾难,因此这种神话生成与“天地父母神”神话的故事结构类同,但具有鲜明的中国历史文化特色。在阅读时,我发现不少章节,前此作为论文发表,受到学界的检验。而今,作者将其整合为书,其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中国神话具有强烈的祖宗崇拜意识,追索其源流演变,推究其叙事类型,寻求汉民族的原始图腾,是把握以血缘立国的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王国红)